

'88

世紀之辯

亞洲大專辯論會復旦大學代表隊



世纪之辩

苏步青题



“88”亚洲大专辩论会
复旦大学代表队 编

学 林 出 版 社

0109197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王建纲

世纪之辩 “88”亚洲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 编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第二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5.25 插页1 字数112,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0册

ISBN 7-80510-161-2/G·32

定价：1.65 元

目 录

TP 316 -- 62/11

TP 316.5 62/714

一九八八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简介·····	1
序·····	2
世纪之辩：亚洲大专辩论会大决赛前前后后·····	4
谈笑用兵：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吗？·····	15
初试啼声：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联合国有无存在 的必要？·····	41
艰难鏖战：庞大的人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担吗？···	60
运筹帷幄：辩论技巧详述·····	82
隔海回忆：相会在狮城·····	93
情深谊长：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09
梦萦魂绕：四月的夏天·····	116
载誉不忘：前前后后的小事情·····	126
归来方觉：“大决赛”才刚刚开始·····	137
附录一 海内外述评·····	143
中台表现出色 准备功夫充足·····	143
复旦重实践举实例 台大败在空泛理论·····	145
同是中国大学生·····	148

海峡两岸青年首次接触的意义·····	153
附录二 亚洲大专辩论会比赛章程(1988)·····	158
后记·····	165



一九八八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简介

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是新加坡广播局自主办大专辩论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华语普通话辩论会。

来自台湾大学、复旦大学、马来亚大学、澳门东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六支大学生辩论代表队参加了这次辩论会。

这次大专辩论会的大决赛在复旦大学队与台湾大学队之间进行。由于这是大陆和台湾的大学生40年来第一次公开对垒，因而倍受海内外瞩目，被称为“世纪之辩”。

上海复旦大学代表队阵容如下：

领队 伍贻康副教授

教练 王沪宁副教授

队员 罗洁（科学管理系四年级）

顾刚（新闻学系四年级）

鲍勇剑（国际政治系四年级）

李光斗（新闻学系四年级）

吕巍（经济管理系研究生）

序

这次复旦的同学去新加坡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拿了个冠军回来，作为校长的我感到非常高兴。

复旦的同学一向有求实和创新的传统。这一次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客观上也为检验复旦学生的素质提供了机会。为了准备这次辩论赛，复旦校内外数以百计的老师 and 同学付出了心血，辩论队的五位同学和他们的领队与教练更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看来，这些努力都是有价值的。

由于这届辩论会有台湾大学代表队参加，所以复旦的队员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海峡两岸的青年大学生，在长达39年的隔绝之后第一次进行有组织的接触，各方面给予关注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大陆的大学生究竟能不能比较好地表现出自己的才识和风度，复旦选派的这几位同学能不能比较好地代表他们的同龄人？说实话，我当时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这五位同学是通过专家的反复遴选，层层公开选拔产生的，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这种形式的辩论会，在我国国内大学里还比较少见。复旦的学术空气固然比较浓厚，

但辩论的风气却并不盛。这五位同学个人的辩论经验也非常的少。这就给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带来不少困难。

在集训过程中，我曾先后两次观看了辩论队的模拟表演，感到一次比一次进步。这是他们全体一致努力的结果，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进入决赛之后，有位台湾记者从新加坡打电话来，问我对复旦大学队取胜的信心。我说胜负并不重要，但对复旦大学队的表现是充满信心的，无论胜负得失，我相信复旦的同学都会有出色的表现。

现在，这五位同学把他们在新加坡三场比赛的辩辞整理出来，并增加了一些辩论技巧的评析等内容，结集出版，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每一位对辩论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了解不少情况，得到更多的感性认识。

希望编写这本书的五位“辩才”能够真正成为人才。

谢希德

1988年5月

世纪之辩：亚洲大专辩论会 大决赛前前后后

那一瞬间如此辉煌。

1988年4月11日夜7时，在新加坡——那座北纬1.17度的美丽小岛，我们捧起了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奖杯。潮水般的掌声轰响而来，每一个人的心房都鼓起强烈的切分音，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溢满忍不住的泪水。

40年来第一次。

经过各自当局的批准，大陆和台湾，第一次公开正式接触。复旦对台大，同龄的大学生只隔着两条长桌。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而青春的智慧是万物之灵最灿烂的花朵。就在这样的夜晚，彼此隔膜了40年的大陆和台湾的大学生第一次举行公开辩论。那语言的机巧，思想的交锋几乎征服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仿佛透过一串串银色的光环，看到民族的精神花蕾在静静地舒展。辩论的题目似乎也是有意为之：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同一个民族，在20世纪80年代，在海峡两岸有着相同的烦恼，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演绎，又把不同的答案捧给每一位华人社会的子民。未来的世纪是宽容的世纪，是寻求语码相通的世纪。我们期待掌声和鲜花，但我们更期待

共饮长江水的豪庆。

于是，闪光灯失去了诱人的光环，震耳的掌声变成了遥远的回响。我们一步跨过去，十六只手握在一起摇动，十六只眼睛都映出青春的面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复旦大学代表队和台湾大学代表队的全体成员，在高亢的音乐声中站在一起，领队、教练、辩论员，十四位代表并排站在“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匾额下，留下了我们的合影，留下了我们炽热的真情……

舌战狮城

在小组初赛中，分在 A 组的我们，4 月 2 日以 5 : 0 战胜澳门东亚大学队，4 月 5 日以 3 : 2 击败马来亚大学队，取得了角逐金杯的决赛权。

与此同时，B 组的台大队 4 月 4 日以 3 : 2 战胜新加坡国立大学队，4 月 7 日又击败香港中文大学队。

至此，大陆和台湾公开对垒的局面已经形成。连日来，新加坡的气温都在 30℃ 上下，而大陆、台湾对辩的新闻又从狮城飞向世界。空气一天天热起来。

第二天早晨，台湾《联合晚报》的张菁菁软缠硬磨从复旦领队伍貽康嘴里掏出了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电话号码：中国·上海·484906。

“谢校长，您对复旦队获胜把握有多大？”

“我不了解其他队的情况，不敢臆断。但我知道，复旦队是有备而去的。”

“您希望哪个队赢？”

“我当然希望复旦队赢。”

接着，她又电话采访了台湾大学校长孙震。

4月8日，台大校长孙震给领队苏玉龙传来手谕：“欣闻进入决赛，谨表贺忱。希望在大决赛中克敌制胜，以竟全功。”

尽管都是为了寻求友谊和理解，可我们也都企盼自己捧杯而归。

大决赛的辩题是：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由于台大队晚两天出线，我们只好无可奈何地等待抽签。结果，我们抽到了反方，我们的立场必须是“儒家思想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风”。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因为新加坡十分尊崇儒家思想，辩题本身就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句家喻户晓的语录。直到辩论的前两天的晚上，我们几位队员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不停，理不出个头绪来。几天来，很多新加坡朋友和大陆访问学者都向我们指点迷津，我们脑海里挤满了各种纷繁的思路。

而翻开此刻的报纸，连篇累牍充斥大决赛的消息。4月10日的新加坡《新明日报》，对复旦队予以详尽剖析：

罗洁：懂得利用眼神、笑容、亲切的口吻和柔美的词藻来争取观众。

顾刚：知识面广、思维敏捷、逻辑性强，可以把抽象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守门员”，也是“神射手”。

鲍勇剑：组织观众、带动观众的能力极强，语调雄浑，举例生动，善于扭转局面。

李光斗：复旦队的怪才，此君满腹经纶，临危不乱，有大将风格。

吕巍：善于组织，阐述力强，思路比较周全，立论十分成熟。

但报界认为，两强相遇，鹿死谁手，实难预料。

4月11日下午4时30分，比赛即将开始，这时采访的记者是我们辩论员的4倍。闪光灯接连闪个不停，造成一种千钧一发的气氛。

出场队员是：罗洁、顾刚、鲍勇剑和我。此时此刻，我们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我们对立论已有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我们想起4月10日凌晨2点，王沪宁教练经过慎重选择，终于跟我们明确了基本立论：“儒家思想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风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功能。抵御西方歪风需要综合治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多管齐下，不是思想改变人，而是社会环境改变人。我们同样热爱儒家思想，但认为它不能抵御西方歪风。”这样的立论既能赢得新加坡人民的好感，又使我方立于不败之地，限制了正方的思路。正方一提出儒家思想以外的条件就会被综合治理的大概念所网罗，这是一个相当精巧的立论。

在激越的乐曲声中，亚洲大专辩论会大决赛开始了。台大队王菲菲初试啼声即不同凡响，上两场比赛中，观众认为她太凶。此次，她一改往日泼辣的表现，以柔美的音调争取人心，她动情地对现代西方歪风越刮越猛表示忧虑，表示只有用儒家思想才能抵御西方歪风。

我方的罗洁以快速的语调反驳对方，指出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能抵御西方歪风。且儒家思想有糟粕，若按“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信条，则不能来新加坡了。此话引起了观众的笑声。

但台大队陈家麟马上反驳，指出《论语》原话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赢得了观众一阵掌声。

顾刚发言了。他以轻松幽默的口气指出儒家圣人孔子在抵御歪风时的惨状。有说服力的事实和雄辩的口才征服了观众，全场为他鼓掌。

当台大队的资深辩手的毛仁杰表述观点时，已乱了阵脚。

鲍勇剑紧追不舍，把综合治理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自由辩论的时间到了。我方依次发言，罗洁表示2000年来儒家思想从未能有效地抵御过“歪风”，难道还要等2000年吗？顾刚继续死咬孔子，使对方大感头疼。鲍勇剑把“孟母三迁”也摆出来了，以示儒家从来都是躲避歪风的。我则反复追问对方同学有什么例子证明儒家思想抵御了西方歪风，在何时？在何地？

自由辩论中，台大队被我们制约着，陷在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八卦阵中，左奔右突也杀不出去。

我在总结辩辞中则强调指出：抵御是指有效抵御，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对方同学把抵御理解为削弱，转换了概念；对方同学把儒家思想理想化、神圣化、宗教化；对方同学先取消西方歪风存在的前提，再来谈儒家思想的抵御是一种“诡辩”。

等到台大队石世豪总结观点时，他们的论点已是进退维谷、攻守两难了。

最为观众激赏的是，在石世豪指出“只要崇儒就能抵御歪风”时，顾刚一针见血：“从吴佩孚到孙传芳，哪个不读经？哪个不尊孔？中国还不是被他们读得百孔千疮吗？”观众又报以一次长时间鼓掌。

最后，评判团宣布复旦队以5：2荣获1988年亚洲大专

辩论会冠军。

对于复旦大学代表队，新加坡报纸认为理论基础深厚，语言辞藻比较优美，表达技巧也比较生活化，常驻评判谢雪华女士认为：“复旦队有排山倒海的雄伟气势。”

《联合早报》评论说：“复旦队词锋锐利，反应敏捷，几乎是对手语音刚落，就可以谈起来滔滔不绝、振振有辞地反驳对方，其思路之敏捷快速实在令人咋舌。”

“中国大学生的代表以其轻松活泼、亲切幽默，以及丰富的学识，敏捷的反应给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人民以深刻的印象。”

.....

一个小时的世纪之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我们记得和台湾同学隔桌对垒的唇枪舌剑，然而我们更难忘辩论场下共同度过的时光。

第一次握手

第一次的相见是在新加坡园景假日大酒店。我们从海峡两岸走到了同一个屋顶下，40年的隔膜曾使我们有过一刹那的迟疑，但也仅仅只是一刹那，我方领队伍贻康教授跨前一步伸出了手——台大队教练叶庆炳先生伸出了手——这是海峡两岸40年来第一次公开握手！守候多时的记者迅速地把新闻和照片传遍了世界。

“辛苦，辛苦呵！”

道一声辛苦，说一句珍重，为了这一句平常的问候，我们曾40年相对无言，我们守候得太久、太久了。

血浓逾水的情感使我们在几秒钟内就亲切攀谈起来。我们发现彼此是那么相像，宛若他乡遇故知。大厅里响起熟悉的乡音，温暖的亲情在大厅里流淌。我们都没有彼此想像的那么漠然，那么不可沟通。海峡分隔了我们，半屏山依然是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可一种对故土的认同，一种同是中国人的信念，却在心灵的深处维系着我们的情感。

或许是过早地染上了职业病，作为新闻系四年级学生的我，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我至今都对新闻圈的一个用语耿耿于怀，他们称我们的交流是——第三类接触。

这是怎样的语言呢？第三类接触——人类和外星人的接触，《众神之车》里对此曾有过天才的描绘和偏执的臆想，而人类的宇航飞行器也已经带着每一个民族的心声向寂寞的太空发出久远的呼唤。

毋庸讳言，无论台上台下我们都难以达成百分之百的一致，但热战、冷战都已成为历史。在星岛绿树成荫的环境里，我们开始平心静气地讲述，开始认认真真地倾听：关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关于台湾向何处去，关于大陆的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彼此原来有那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时我们各执一端，难分难解，最终也难以达成默契，但对话终于开始了。

我们永远记得，4月3日的下午，在新加坡园景假日大酒店的咖啡屋，台湾《联合晚报》记者张菁菁、台湾《联合早报》记者张丽伽、吕巍和我曾有过一场一点也不轻松的聊天。

张丽伽是台湾省籍人，大陆对她来说是遥远的神话。她每每声称自己是台湾人，每一次的对答之后，她都以记者的狡黠，把问题拉回到“台湾向何处去？”但对台湾经济富裕的

自我矜持却使她的答案与我们的答案有着天壤之别。

我问她是否承认一个民族的人为分离是人类的不幸。她则王顾左右而言他。吕巍显得有些激动：“你难道愿意继承一种灾难制造另一种灾难吗？”

唉，如果我们的语码能在一瞬间全部接通，那么这个星球将会变得何等美丽。

沉默了好久的张菁菁开始插话。她是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四年级的学生，这次是台大队的随队实习记者。她的父亲祖籍河北，1949年去台湾，经常向她讲起故乡、故人、故事。

“我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这是张菁菁的原话。说过之后，她就听从我们建议开始谈轻松的话题。

“去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去做环岛旅游。”这话让人想起太平洋中那个略似扇形的宝岛，我关于它的一切印象都来自蛛网交错的中国地图，来自方块汉字勾勒的文章、书籍。我和吕巍都静静地谛听那座岛上的人和事。

“每年的假期我都走5000里的路途。”这是我的优势，一个热衷于在中国大地上旅游的人的优势。前一天，台大队的陈家麟曾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看大陆风光录像带。于是我讲起苏杭的玲珑精巧，讲起中山陵的雄伟，讲起长城的红叶，讲起秦皇兵马俑，讲起泰山孔子封禅处……这一切都曾使我流连忘返。人同此心，我相信她们也有兴趣。我注意到，我讲的时候，她们也都静静地谛听。

4月12日，分手的早晨，张菁菁送给我们一张大家在一起的合影照。我注意到了后面的留言：“相信我们都会记得这段难忘的日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记得在新加坡的每一寸时光。

交流对话使我们之间的误解与隔阂在慢慢地消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冰山的化解也非一日之功。但在赤道附近的温暖阳光下，在我们炽热的语流中，丝丝缕缕充满人情味的春意，在点点滴滴地流露着。

抵达新加坡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广播局为我们举行的午宴上，我们和台大队的同学交换起各自了解的信息。由于个人的偏好，我和他们聊起台湾文学界的情况，谈起台湾的“新生代作家群”，谈起每年一度的《联合文学》评奖辞，而我也了解到大陆文坛的诸多活跃分子在台湾亦有广泛的介绍。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高高大大的台湾记者一声不吭地望着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台湾《中国时报》的驻东南亚特派记者徐宗懋，不久前，他曾到过广州。

临别时，徐宗懋送给我一套精装的台湾版《世界中文小说选》。在扉页上，徐宗懋留下了这样的赠言：

“予书赠有心人。虽然相隔遥远，我们仍会在心灵的世界相会。”

我想，他是真正的有心人。

我坚信我们的接触不是第三类接触。

.....

4月11日晚，台湾三家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通过卫星转播了10分钟大决赛的实况。这突破了以往台湾电视报道大陆和台湾体育交流的新闻3分钟的限制。第二天，大决赛的实况在台湾全岛播放。台湾为此付出了10万美金，尽管台大队是决赛中的输家。